关于清代督抚甄选的考察

王 雪 华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其政治制度建设已逾封建社会历朝之首,显示出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绝对化高峰的特征。在中枢机关的设置上,军国大权的掌握由顺治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转至内阁,又移为康熙时的南书房,再至雍正时的军机处。随着中枢机构权力的递变,其机构本身便愈来愈成为皇帝弄权的御用衙门和驯服工具,促成了君主集权政体的形成。对于中国广大地方区域的统治,除少数地区设立将军和大臣抚治以外,清代实行以总督、巡抚统辖各省的地方管理制度。督抚是为“综制一方”、“统辖文武”的封疆大吏,中央一切施政方针均需首达督抚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督抚而收集权实效,督抚是中央控制全国各地局势的主要力量。督抚作为地方官,原则上不受中央各部指挥,直接奏事于皇帝,因而督抚又成为牢固王权,拱卫朝廷的有力工具。督抚既与清朝地方统治的稳定密切关联,因此,清廷对督抚的人选十分重视和审慎。本文就督抚甄补选用诸情形加以考察,使我们对清代的督抚制度和清朝地方统治的特征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

一、督抚的甄选途径

清代的皇权在政治体制和组织结构上,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点,中央及地方各项大权均总揽于皇帝,皇权不为任何机构和舆论组织所控制,而督抚受任为封疆大吏,必须直接对皇帝奏事并负完全责任。清世宗在对督抚的上谕中说过:“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又说:“国家任官守土,绥辑兆民,封疆之责,惟抚臣为重。”^①封建皇帝正是首先依赖最高层的督抚来管理全国各地事务,通过督抚监察地方各级官吏,使下情上达。由于督抚于中央或在地方都居于极重要的位置,它的人选必然受到皇帝的重视。清代甄选督抚的一个很为人注目的方式,是由皇帝全权任命,“特旨”补放。康熙十一年(1672年),福建总督缺人,其时“闽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极,为天下第一烦剧要地”,康熙帝认为:浙江巡抚范承谟“廉能素著,亦为天下最,故特倚任”^②,以范为福建总督。康熙三十年(1694年),“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卒,上难其人,以授(范)承勋。并谕:‘承勋坚定平易,当胜此任。’”^③承谟、承勋是清初著名文臣范文程之子,他们为皇帝所青睐也在常理之中。又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上谕:“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为吴江令,居官甚善,百姓感颂至今。其人有胆量,可授湖广总督,命驰驿赴任。”^④也是皇帝特旨补放之例。

不容忽略的是,清代皇帝以勤勉谨慎著称,没有出现过明代不理政事的武宗式皇帝,也无专以敛财为旨的神宗一类主子,因而对于地方官员的任用能够切实把握大权,并辅以密折制度等方式及时了解和控驭督抚,这样,特旨补放督抚才成为可能。既是特旨补放,则权在皇帝手中,皇帝自能乾纲独断。但是,皇帝为了审慎起见,有时也会四下打听新督抚的情况,搜集其他地方大吏的意见,使各省督抚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拟擢贵

州布政使毛文铨为巡抚，便咨于云贵总督高其倬，“毛文铨朕用为贵州巡抚，尔意更以为何如？”^⑥认为毛文铨确实合适，才任为巡抚，以后一再向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礼哈打听毛居官如何，“毛文铨之向曰居心行事，并近来吏治如何之处，据实折奏以闻。”^⑦看来为清代皇帝实不容易。满族出身的皇帝对全国实行民族统治，必须在用人、行政等各个方面采取慎重认真的态度，才能争取民心，稳住天下，这是清代政治局势与前代王朝有所不同而形成的特点。皇帝指定他所中意的官员任为督抚，自然不受任何法律条例的限制，这种选任方式，既能看出督抚之职的重要，也是封建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制度与法律的权力的反映。当然，皇帝不可能负起所有选任督抚的重务，在督抚的甄选中，特旨补放只能占少数比例。

督抚的第二种甄选途径为廷臣会推保举。清朝遇有应议大政大狱向由九卿会议，顺治六年议准，“总督、巡抚员缺由会推保举题补。”^⑧并有旨：“自后用督、抚、提、镇，内院九卿咸举所知。得人者赏，误举者连坐。”^⑨又有顺治十一年(1654年)谕：“督抚缺出，即于次日会推。”^⑩康熙六年(1667年)也规定：“嗣后督抚缺出，不拘内外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优者，敕部院大臣从公保举，授以兹任。”^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湖广巡抚张汧，即为侍郎王遵训、学士卢琦、大理寺丞任辰旦所保举，故称“督抚、监司皆由廷臣保举。”^⑫可见，关于督抚甄补，常由廷臣会推，然后报给皇帝裁决。但是，廷臣会推是向皇帝推举适任人员，并不能决定督抚的最后人选，皇帝可以驳回会推所荐人物，另行选择。如康熙八年(1669年)，“江宁巡抚缺，命议政大臣等会推满洲郎中以上、学士以下通汉文有才能者备擢用，举奏皆不当上意，特以命玛祐”^⑬。又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卿会推学士孙在丰、浙江布政使石琳堪任江宁巡抚，而康熙帝认为汤斌“有操守”，于是汤斌是为江宁巡抚^⑭。事实上，皇帝不可能了解他的所有属下官员，因而一般情况下，皇帝多从廷臣之举。

督抚之选除开皇帝特旨补放、廷臣会推两种途径以外，更主要的是由吏部开列具题请旨。督抚之职缺出，非奉特旨补放，例由吏部或军机处开列适合受任人员名单，随题本奏呈皇帝，皇帝在名单中选定一人授职，此即“外官督抚藩臬以开列”^⑮。甄补督抚的最主要途径是为此种。此外，于军务之际，遇有官员因军功应擢任为督抚者，亦由吏部拟议，请旨定夺。

观诸甄选地方督抚的三种途径，皆最终决定于皇帝。由此可见清朝皇权高度集中的事实，也反映出督抚的人选关系到吏治民生，于国家的治乱兴亡有切实之责，因而皇帝必然干预其中，重视其人选。但是无论如何，清代君主专制程度已达顶点，督抚虽肩负统领一方的重责，而皇帝对督抚的任免罢黜均握有最高权力，督抚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即如有“中兴第一名臣”桂冠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皇权之下，也似履冰临渊，惧“圣眷之差，不能始终”，他在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以前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说：“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⑯当这位湘军的首领在安庆听到湘军攻陷天京的消息，竟是绕室彷徨，彻夜不眠，谋划退路。于是，自请削其财权和兵权，得以保全自己的地位。由此可以理解，清代所能产生的只会是鄂尔泰、李卫和田文镜这类一味逢迎皇帝的地方官僚，而不可能出现明代海瑞式直言抗命的忠臣，这无疑是封建皇权在清代达到空前集中的弊病所在。

二、督抚选用中的诸种现象

总督、巡抚官为从一品和正二品，共同管理一省至数省军民各政，清代皇帝将封圻大权分寄于各省督抚，必须使其胜任此职，才能收到中央集权之效。所以督抚通常选用何人，其任职前的治政经验如何十分重要。清代十朝任督抚者人数众多，下面就笔者收集的465名督

抚的资料，分析甄补督抚中的几种实际情形。这465名督抚在各朝的分布人数如下(历任两朝者，收入其中一朝计算)：

朝 代 人 数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总计
	31	84	40	113	46	43	32	34	39	3	465

省内重要官员，除总督、巡抚而外，其下有具体掌管一省行政及财赋的布政使和管刑法的按察使。其中布政使在明代是一省最高首领，清代乾隆朝以后始成为督抚属员，不过布政使在地方仍具重责，“掌宣化承流、帅府、州、县官，廉其录职能否，上下其考，报督、抚上达吏部。三年宾兴，提调考试事，升贤能，上达礼部。十年会户版，均税役，登民数、田数，上达户部。凡诸政务，会督、抚议行。”^⑥可见，布政使于民、财二政皆积有治理经验，又与督抚同属省级地方官员，以布政使为巡抚，再升至总督，一般可以顺利地胜任其职。下面就清代布政使及其他官职选任督抚的比例情况，列表如下(百分比的计算按四舍五入法简化)：

朝 代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合计
选自布政使人数	5	21	19	68	33	30	19	21	33	2	254
所占百分比	16%	25%	47.5%	60%	76%	70%	59%	73%	82.5%	67%	55%
选自其他官职人数	26	63	21	45	13	13	13	10	6	1	211
所占百分比	84%	75%	52.5%	40%	30%	30%	41%	27%	17.5%	33%	45%

上表可见，布政使升任督抚的情况在清代各朝均有存在。顺治、康熙两朝，因处于政权建立初期，地方尚不稳定，也缺乏雄厚的实力和基础，因而以地方布政使任督抚者分别只占该朝总数的16%和25%，而多以中央官员充任督抚。乾隆以后，随着政治局势的稳定，王朝的各项行政均纳入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轨道，乾隆直至宣统，布政使任督抚的比例均超过该朝甄补总数的一半以上，同治、光绪两朝竟达73%和82.5%，这与咸丰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后所形成的局面有关。在镇压农民革命的过程中，地方大吏依靠地方军事力量和财政等有利条件，在权力上较之清朝前期获得了很大提高，遂成地方势重之状，以致中央转而需要仰赖地方势力。故同、光时期多以布政使为督抚的现象，正是此时地方力量增长的反映。观察督抚选自布政使和其他官职之比例，清代以布政使为督抚者占甄补总数的55%，为一半以上，足见以布政使充任督抚的现象十分普遍。清代多以布政使充任督抚的事实，正符合布政使的正常升迁轨道，也适应了督抚任官的需要，因为布政使任督抚前即具有治理一省民、财二政的经验，他们一般较为适任。

清代督抚的选用，除布政使占甄补总数(465人)的55%，另有45%(211人)是以其他官职充任。下面就211名督抚的资料，观其任督抚前的职务来源。

以侍郎充任督抚者共56人(仅据211人的资料而言，以下各处亦同)，学士28人，都御史19人，按察使13人，分别占据前四名的位置。以占第一位的侍郎而言，六部侍郎之职仅次于尚

书，与督抚品位相埒，具体掌管和执行全国各个方面的大政，对地方事务亦有全面的了解，以侍郎为督抚，可较好地胜任其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光绪五朝均有学士任督抚的现象，占其他官职中甄补督抚的第二位。虽然内阁的职掌和权势在整个清代不是始终如一，但在乾隆二年(1737年)复设军机处以前，内阁地位尊崇，军国机要一般综归内阁，所以内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和学士均具有综理政务或参赞政务之经验，也可胜任督抚之职。第三位是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监察政治得失，遇有重大案件，刑部须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公审定断，凡大政要事经九卿议者，都察院都要参加议奏。在都察院中，右都御史衔例为总督兼衔，右副都御史衔为巡抚、河督、漕督兼衔，都察院不再设员。明代初遣督抚至地方时，即是以部院大臣出任，久任不归始成为固定职官，可知部院侍郎和都御史均与督抚有渊源关系。第四位是按察使。按察使之直升巡抚，实为超擢使用，按察使在一省中，其地位略逊于布政使，职专一省刑名按劾之事，重大案件要与布政使会议办理，所以在211人中所占比例仅为6%。按察使之下，其他依次为提督(12人)、漕督(11人)、将军(11人)、尚书(7人)、府尹(顺天府尹5人，奉天府尹1人)、河督(6人)、总督仓场侍郎(6人)、道员(6人)、额真(4人)、大理寺卿(少卿)(3人)、大理寺丞(1人)、总兵(2人)、盐政(2人)、浙江整风观俗使(2人)，余下通政使、内务府总管、宗人府府丞，都察院理事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学政、钦天监监正、提学道金事、盛京兵部侍郎、兵备道参政、哈密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副都统各一人，均被任为督抚。

新任督抚能否担负起封疆重任，与其历官之经验有着密切联系。简言之，督抚任职前之历官可分为中央官员、地方官员、中央与地方官俱任过者以及军职人员等四类，其中当以兼有中央与地方官历者最适任。督抚属地方最高级长官，综理省内各项大政，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起着上下承启的重要作用，以仅有中央官历者为督抚，则于治理地方时缺少实际管理的经验，不谙民情，仅有地方官历者为督抚，又未能明瞭中央政情，于各项大事的施政中难免失之于全面。现据所计465名督抚的资料，分四种情况来考察清代督抚任职前之官历。见下表：

朝 代	顺	康	雍	乾	嘉	道	咸	同	光	宣	合 计	所 占 465人 之 比
	8	37	20	77	39	38	22	16	23	2		
兼有中央和 地方官历者	8	37	20	77	39	38	22	16	23	2	282(人)	60%
占该朝之比	26%	44%	50%	68%	85%	88%	69%	47%	59%	67%		
仅有中央官 历者	12	31	6	13	2		1				65(人)	14%
占该朝之比	39%	37%	15%	12%	4%		3%					
仅有地方官 历者	5	13	13	23	5	3	8	18	16	1	105(人)	23%
占该朝之比	16%	15%	32.5%	20%	11%	7%	25%	50%	41%	53%		
军 职	6	3	1			2	1				13(人)	3%
占该朝之比	19%	4%	2.5%			5%	3%					

由表中观之，清代督抚以兼具中央及地方官历者为多，清代十朝中共有282人，占总数（465人）的60%，仅有地方官历者占23%，仅有中央官历者占14%，仅具军职者占3%。可见，清代督抚之选任有注重任职者是否兼有中央及地方为官临民经验的取向，比较注意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历两种情况，其中又以担任地方官历者为多，因此由地方低品官位逐步提升至督抚者亦为不少。清代单以军职升任督抚者只占3%，其中顺治朝6人，占31人中的19%，是比例最高的一朝。此时，清朝刚建立，以有军功者充任督抚是为常例，也便于地方统治的稳固。清代督抚中仅有中央官历者，只占14%，其中顺、康两朝比例较高，均占该朝甄补督抚的30%以上。在建国之初，中央官员有军功及其他建树者任督抚多于地方官，这是因为他们接近皇帝，易受眷知，在中央任官既久，还会在感情上对朝廷产生倾心的心理，以之充任督抚，便于皇帝把握地方，利于中央集权，这与前述顺康时期，任督抚者很少由布政使出身的现象也是一致的。

清代是满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在立国之后，于中央机构采用满汉复职的办法，多用满洲贵族掌实权，以维护本民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也笼络汉族地主，授以官职。但是，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还有人提出《化除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⑩，由此更引出许多“化除满汉畛域”的奏折，可知有清一代满汉之别始终存在。那么，清代在地方政制上是否也具有民族统治的色彩呢？清廷并未在地方机构中明确规定满汉之别，但我们通过下面对清代督抚选用中种族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统治者在治理地方中，实际亦颇具民族统治倾向。

以清代督抚的民族而论，在外满、蒙、汉（有汉军和汉人之别）三种。在465名督抚中，汉人和汉军旗人计344名，占所统计465人中的74%，满人计102名，占24%，蒙古人计9名，占2%。所以仅就督抚中满汉之比例而言，清朝所任督抚中汉人（包括汉军旗人）占绝大部分。对此，须作两个方面的分析。按两个民族的人口比例，满人为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远非广大的汉族可比，竟占甄选督抚的24%之多，可见清帝对督抚之位十分重视，故力以满人掌之，以更多地集权于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不过，汉人能占甄补督抚的绝大部分，可以体现清代统治者“以汉治汉”的为政方针，较之元代蒙古统治者推行的民族高压政策显然有所不同。元代蒙古皇帝极力划分四个民族等级，地方路府州县各级长官达鲁花赤，定制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行省的最高官员更是任用蒙古人，汉人和南人只能担任副贰职。用兵之事也一概由蒙古人掌握，汉人与南人不得过问。清代皇帝却是力图以各项措施笼络住汉族上层和广大士大夫阶层。康、乾二帝还于科举正科之外，特设博学鸿词、博学鸿儒等科，征得了相当一批汉族名流。对地方督抚的任命，清朝名义上不存在满汉之别，而且清朝皇帝历来标榜“不分满汉，一体眷遇”。这些显然是清代统治者高于元代蒙古统治者之处，也是清代能够统治中国，使其形成大统一和较长时期繁荣局面的成功之处。此其一。

其二，465名督抚中，顺治一朝有31人。这31人都系汉军旗人和汉人，其中汉军27名，占87%，为汉军任督抚最多的一朝。因为清朝刚建立，进关后疆土骤增，自然需要满汉兼用方能维持和巩固政权，而汉军属满、蒙、汉八旗之一，受满贵族直接控制，是维护清朝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以汉军统领汉族区域，更能起到满人所不及的作用。因此，汉军官员受到了顺治帝的重用，被委以封疆重责。从出身地域来看，这些汉军又多属辽东人，清人入关以前，最早经营的汉族地区为辽东，他们归属较早，在清廷看来，可以依托。顺治以至康熙、乾隆之后，全国局势趋向稳定，多任汉军旗人为督抚的现象便有了改变。嘉庆以后，用汉军旗人为督抚的情况已不多见。

其三，清朝十分重视与蒙古族的关系，在政治、经济上给予蒙古贵族甚为优渥的待遇，清朝还通过与蒙古族通婚联姻，加深与蒙古族的关系。努尔哈赤、皇太极和顺治帝的后妃中均有蒙古公主，皇室之女也嫁与蒙古王公，因而有效地实施了对内外蒙古广阔地域的统治，同时，也使曾经十分强大的蒙古族成了清朝在北方的驯服工具。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盟旗制度，由本旗的上层人物任旗札萨克、本盟王公贵族任盟长，以盟监督各旗，终统于中央理藩院。另有一些蒙古旗未设札萨克，则仿满洲八旗制设立了蒙古八旗实行管理清朝笼络蒙古贵族，使他们效力于清廷，保证了对蒙古地域的统治，因而管理中原地区的督抚中，便很少再用蒙古人。在清朝所任465例督抚中，蒙古计16人，仅占2%。

其四，除顺治朝，历朝均有满人任督抚。满督抚比例最高时为乾隆和宣统两朝，乾隆朝113例督抚，满人46名，占该朝甄补督抚的41%；宣统朝3例督抚，满人即有2名，占该朝甄补督抚的67%。乾隆皇帝极重满汉之别，为人所共知。而宣统时期，鉴于同、光间汉人督抚权力过大，且清朝临界灭亡，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故统治者在收权于中央的同时，对汉人督抚加以抑制，多以满人任督抚。

其五，汉人督抚占该朝甄补之比例最高者为同治一朝。所计34名督抚中，除3名为满人外，余下的31名均是汉人，占91%。因为咸丰、同治时期，清廷需要依赖湘军和继起的淮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便不能不对过去督抚任用中重满轻汉的思想稍作改变和调整，并给湘淮军首领以军政实权，因而各省督抚多为汉人占据，一时出现外重内轻的局面。汉人督抚的崛起，既在一定程度上免去了清朝亡于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也引起了清廷上下的忧虑。因而光绪以后，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反映在地方督抚的满汉之用上，是满人任督抚的比例趋向回升。同治时，满人督抚占该朝甄补督抚之比仅是9%，光绪时39例督抚中，满人8名，所占比例上升至20%，宣统朝竟占67%之高，清朝在将亡之际，防备汉人之心又一次高涨。

其六，一般而言，总督职权高于巡抚，在咸丰以前尤其如此。在总督的设置上，比较满汉甄补督抚总数之比，可以发现满人为总督的比例高于汉人。在465例督抚中，汉人甄补督抚总数为344人，其中任总督者和督、抚皆任过者计有145人，占344人中的42%；满人督抚总数为102人，其中任总督者和督抚皆任过者有74人，占满人甄补督抚总数的73%。可见在满汉督抚之任中，满人更多的是占据总督的位置，由此显示出清朝统治者在地方督抚的设置上对满人的倚重，这是清朝统治者始终存在着的民族猜疑之心的实际表现。

从以上所分析的465名督抚的情况来看，清朝所任督抚中，一半以上选自布政使，次为六部侍郎，以及学士、都御史等职。督抚在任职前的历官经验上，兼有中央和地方官历者占61%，可知清朝对督抚人选非常审慎和重视，即使督抚任职前后的地位相当，同时也注重实际经验，以保证能担起封疆之责，这两个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保证督抚质量的作用。但是，清王朝是以满贵族为统治核心的封建王朝，这种民族统治特色也必然在督抚制度中有所反映。在465名督抚中，本属少数民族的满人，其督抚竟占24%，显然与其民族人口的数量之少不相适应。又于总督和巡抚的选用上，由于督权重于巡抚，满人任总督的比例高于所任巡抚的比例，而在汉人的督抚之任中，更多的是任巡抚，这是清代为掌握地方最高政权而实行的一种民族统治方针，自然也是作为封建统治者所不能避免之处。

以上叙述了督抚甄选的三种途径，并根据笔者所收集的465名督抚的资料，简略分析了甄补督抚中的几种实际表现，从中可以看出，清朝对于地方督抚甚为重视，而督抚也适应了专制皇权高度集中的需要，成为清王朝统治四方的有力的驯服工具。清朝实施的督抚制度确为封建时代较为成功而富有实效的地方管理制度之一。

(下转92页)

- ⑥ 《汉书》，颜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 ⑦ 《旧唐书·职官志》
- ⑧⑩⑬⑭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 《明通鉴》卷10第489页、491页、卷18第791页、卷20第849—850页、卷28第1116—1117页、卷85第3277页、卷23第924页、卷31第1196页、卷31第1213页、卷32第1247页、卷41第1539页、卷56第2132页、卷53第2192页、卷60第2327页、卷63第2476页、卷69第2702页、卷81第3141页、卷84第3204页、卷84第3233页。
- ⑩ 《明史》卷142，《暴昭传》。
- ⑪ 《明史》卷149，《夏原吉传》。
- ⑫ 《明史》卷10，《英宗前纪》。
- ⑬ 《明史》卷158，《耿九畴传》。
- ⑭⑮⑯⑰⑱⑲ 《明史》卷73，《职官志二》。
- ⑳ 《明史》卷254，《曹于汴传》。
- ㉑ 《嘉靖实录》十四年八月乙巳
- ㉒⑳㉔㉕㉖㉗ 《明会要》卷34，《职官六》。
- ㉘ 《明史纪事本末》卷45
- ㉙㉚ 《明史》卷159，《李仪传》。
- ㉛ 《宣德实录》十年十二月丁未
- ㉜ 《正统实录》八年九月戊寅
- ㉝ 《成化实录》四年四月癸丑
- ㉞ 《景泰实录》元年闰正月癸亥
- ㉟ 《天顺实录》二年五月壬寅
- ㊱ 《正统实录》十一年六月丙辰
- ㊲ 《明史》卷222，《殷正茂传》。
- ㊳ 《弘治实录》八年四月辛巳
- ㊴ 《成化实录》十五年五月甲子
- ㊵ 《明史》卷256，《毕自严传》。
- ㊶ 《明史》卷223，《李化龙传》。
- ㊷ 《明史》卷172，《侯璉传》。
- ㊸ 《明史》卷172，《王未传》。
- ㊹ 《明史》卷177，《王翱传》。
- ㊺ 《景泰实录》四年四月庚子
- ㊻ 《明史》卷178，《韩雍传》。
- ㊼ 《明史》卷171，《王越传》。
- ㊽ 《明史》卷205，《胡宗宪传》。
- ㊾ 《明史》卷226，《张瀚传》。
- ㊿ 《嘉靖实录》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
- ①② 《明史》卷259，《范志完传》。
- ③④ 《明史》卷260，《熊文灿传》。
- ⑤⑥ 《明史》卷260，《丁启睿传》。
- ⑦ 《明史》卷260，《杨鹤等传赞》。
- ⑧ 吴廷燮：《明督抚年表·自序》。

(上接98页)

注释：

- ① 《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 ② 郭登峰：《历代自叙传文钞》(上卷)，《画壁自序》。
- ③ 《清史稿》卷232，《范承勋传》。
- ④ 《清史稿》卷270，《郭琇传》。
- ⑤ 《雍正硃批谕旨》高其倬，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日。
- ⑥ 同上书，石礼哈，雍正三年正月十三日。
- ⑦⑧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吏部·官制》，“各省督抚”。
- ⑨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
- ⑩ 《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 ⑪ 《清史稿》卷282，《陈紫芝传》。
- ⑫ 同上书，卷273，《玛拈传》。
- ⑬ 同上书，卷265，《汤斌传》。
- ⑭ 《大清会典》(光绪朝)卷8，《吏部》。
- ⑮ 《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7页。
- ⑯ 《清史稿》卷116，《职官三》。
- ⑰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